



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

西部的纹脉

周涛◎著 □敦煌文艺出版社

长城外长篇精品系列

西部的纹脉

周 涛 ●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特约编审:管卫中

书 名 西部的纹脉

作 者 周 涛
责任编辑 李保军
封面设计 何 伟
版式设计 木 车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印 刷 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1.3125
字 数 256,000
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6,000
书 号 ISBN7-80587-324-0/I·285
书 价 14.85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周涛先生六记

●赵光鸣

我第一次知道周涛这个名字，是在70年代初期复刊的《新疆文艺》复刊号上。那一期同时登了他的一首诗和我的一篇散文。我那篇为一个生产队学大寨瞎吹一气的所谓散文，自然不堪卒读；他那首十大喜讯传到帕哈太克里的诗也实在不敢恭维。那时候没文学。

这以后不久，我便在昌吉见到了他本人。其时，他在边荒的南疆地区工作，令尊令堂大人则正值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出干部队伍被下放到距乌市几百公里的吉木萨尔县农村务农。一家人七零八散。其大弟周晓红招工到昌吉电线厂工作，和我所在的昌吉报社在同一条长街上，我们因同在米泉县长山子修过几年地球，进了小城后仍然过从甚密。一日，晓红正色对我说：“我哥从南疆来了，想拜访一下孙涛，你帮忙给引荐一下。”

老诗人孙涛是张永枚的同时代人，都在朝鲜志愿军某部服过役，诗名虽不及张永枚显赫，在新疆却也十分了得。但时逢乱世，家庭离散，活人不易，居然能想到拜师学诗，这便使我对当时的无名小卒周涛平添几分好奇、几分敬佩。我们是在昌吉州府的大街上见的面，他推着晓红为他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，和我握握手，寒暄一阵，便稍许有些羞涩地说出想拜见老孙的意思。这时的周涛二十来岁，身材颀长，眉清目秀，穿着简朴，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和落魄，说话小声细气，全然不像后来那么嘶哑和神气活现。在带他去州文工团老孙家的路上，他还屡屡试探问我，老孙人怎么样？健谈吗？平易近人吗？神态颇有些忐忑。不料老孙竟不在，铁将军把门，让我们结结实实吃了一顿闭门羹。

拜访老孙不遇和帕哈太克里的诗一样，都属于周涛过去稍感羞愧的话题。每每提及，他便仿佛有些尴尬，继而嘿嘿搪笑，企图插科打诨蒙混过去。其实，他也并不是认真想要掩饰，在他极为得意的时候，提到多年前写过的歪诗，及他诚惶诚恐去看老孙的神态，他会觉得格外有趣。回忆添加一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，仿佛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不是周涛，而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。

二

那以后，大约过去了10年，我才再次见到他。

这十年世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变化之一，便是新疆诗歌在中国诗坛的异军突起，其领军的人物，就是被称为“边塞三诗人”的杨牧、周涛和章德益。此时的周涛正如日中天，处在踌躇满志的最佳状态。

我们的见面是在新疆作协和《新疆文学》召开的一个征文颁奖会上。租借的会场在一座七拐八弯的旧楼顶层上。周涛站在楼梯

顶部平台上，容光焕发，正不亦乐乎地同每个上楼者频频握手。

我以为他一定记得我十年前的引荐之劳，且自恃和他弟弟是朋友，并且在昌吉时还陪其令尊大人散心三日，他一定会见面叙叙旧情吧，便大喊一声：“周涛兄，别来无恙乎？”不料他竟无动于衷，正顾居高临下朝着鱼贯而上的人们，只侧身象征性地朝我伸了一下五指，算是握过手了。我涨红了脸狼狈离开，进会场后找个僻静处坐下，心想真是世态炎凉，今非昔比啊！

他大概很快嗅出味道不对，坐下后即问身边的人：“刚才那个人是谁？”知道是我后，立即跑来同我热情握手，但这时，彼此都感到非常尴尬了。

这次尴尬的见面后来被他写进我的第二个小说集子《死城之旅》的序言中，字里行间，都透歉疚之意。周涛待人，有时确实有些轻慢，但此事当属例外。一面之交，隔绝十年，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原不足怪。

这以后，他调军区创作室，见面的机会多了一些了。那件事他好像总歉疚着，总想找机会弥补。见了面，每每主动握手问候，特亲热地拍拍肩膀，故意说些只有深交才说的那一类粗言俚语，其热情的过分夸张往往使人生疑。一次，我们同去昌吉，回乌市时他的车将我送到我家所在的财经学院大门口，本可招招手掉头就走，他竟郑重其事下了车子，特意握手道别。礼貌太过，反使我老大不消受。

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《远巢》出版后，特意送了他一本。大约一个月后，在作协见了面，说了几句闲话后，他突然紧一紧脸，一本正经说：“你那本书我都读了，不错，真是不错。”

我知道他绝无可能在短短的一个月里，抽得出时间读一本近30万字的小说集子。便笑着打了几声哈哈，对其拙劣的谎言未予揭穿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不知怎么心血来潮，读了我的两篇小说《郎库山那个鬼地方》和《野味馆子》，大加赞赏。认为“它们和我想象中的一类小说完全一致，我觉得这种呼之欲出的、酝酿已久的小说终于诞生了”。他当时正在写他的长篇散文《游牧长城》，信手便将小说中的两处细节直接引到其长散文的“甘肅篇”中去。他认为我写的户儿家和马一起，站在空旷的野滩上撒尿，尿在日光下银光闪闪，粗猛地砸在路边的白硷泡子上，溅起一片白粉……这一类的描写非常传神，非常精彩。对产生于土地、乡野的那种拙朴、粗犷之美，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敏锐鉴赏力。

周涛爱马。他的许多诗和散文都写过马，是汗血马那类的良骏。在他看来，马是雄豪、飘逸、高贵的雄性的代名词。因其偏爱马，故对我的几篇小说中把男人的大笑比喻成马嘶，饶有兴趣。认为这是我的一个发明，就像他发明了“钢盔”这个词一样。

“老实说，你以前写的那些小说，我连一个字都没有读过。”这次，他说了实话。我猜他早把以前说过的那话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“没有时间。他妈的，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！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
周涛读书极多，然而也不求甚解。古今中外，文学的、哲学的、历史的、政治的、地理的、宗教的、艺术史的，甚至乡志野史一类的闲书杂书，无不涉猎。他从博览群书中受益。没有渊博的知识积累，不会有现时的周涛。许多人只看到他的超乎寻常的禀赋、灵气和才情，却很少想到他关起门来苦苦攻读、孜孜以求的情形。

三

周涛的书房兼写作室，除了满满当当的几大架书，墙上还悬着几柄刀剑，其中还有柄俄式骑兵马刀，很有些文治武功意味。另一面墙上，有一轴条幅，是贾平凹手书的“狂涛”两个字。平凹先生不

是书法家，字并不十分好，但眼力不错，就送这两个字，饶有一些深意。

周涛本人并不怎么喜欢这个“狂”字，认为犬边带王，是犬儒主义和不被承认的王。他说他欣赏的是自信、高贵的尊严和人的骄傲，但不欣赏狂。他认为自己很谦虚、真诚、坦率，而且近乎轻信、对人友爱。但同时也承认自己也有普遍存在的人性的弱点，承认自己言语偏激、性情浮躁，也有时伤人。

这是他的自画像。

我认为他画这像时是诚实的，基本上没有走样。

周涛的骄傲是一种骨子里的骄傲，即使他有时做出笑容可掬、非常谦恭的样子，他那种骨子里的居高临下，也无法完全掩饰得掉。我猜想他在那些权贵显要面前，大概也是这样的态度。他脸上笑着，可亲可爱，一脸谦和，似乎总处在对方的视线之下，其实正相反。这种骄傲，在自然界所找到的对应物便是山，那些雄踞的、傲视一切的、严峻崇高的大山，时常在他的笔下出现，被他满怀激情地称颂着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的目光首先总是被山所吸引，好像他生来就和山有种默契似的。这骄傲体现到职业上，便是凛然的职业自豪感和敬业精神。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人，像周涛这样把自己痴迷的写作事业，看得这样重要，这样尊贵。的确，在一些场合，他偶尔也曾流露过一点对优越条件的羡慕，发过些“无车弹缺怨冯谖”一类的小牢骚，好像有些六根不净，微得并不十分彻底似的。实际上，偶尔的扰乱，从未使他的初衷发生过丝毫的动摇。凡是他要固守的东西，他都守护得固若金汤。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，叫作“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”。内中写道：“弃了笔的作家是值得怜悯的，因为他这样做就已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一件事。一个放弃了初衷的人，在茫茫人世间，在每日每时的变化和运动

中，他的内心一定是凌乱的。”

他称那些到处凑热闹、只想在所有能引起兴奋的事中捞好处的人是小偷。一次，我提到一个弃了笔的人，干啥啥不成，还到处作践爬格子的人，大骂文学狗屁不是。这个人他也认识，他听后嗤之以鼻，说这种男人没有丝毫分量，轻如鸿毛，比被阉割掉阳具的人还不如。

在一个无话不谈的晚上，我偶尔瞅见报纸上一位省级领导的照片，发了点感慨，我说这样一个大头夯脑、五官不整齐的人，怎么也爬到这样高的位置。没想到周涛竟对此大加纠正，说我不能这样以貌取人。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路数。容貌和政治才能没有必然关系。一些政治家其貌不扬，木讷迟钝，胸中却有百万甲兵，运筹帷幄，大有王者之气。

他一向自认是个优秀的人，但知道山外有山，人中有人。对本行当里或别的行业里的同样优秀的人，他由衷地怀着敬意。他说他很爱才，非常看重有才能的人。这的确不是妄言。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得到过他的热情而又真心诚意的帮助。他认为没有优秀、杰出人物的人群是可悲的，有了这样的人物而不知道爱护、拥戴，反而千方百计地想要湮没他，这就更加可悲。由愚蠢的人组织的社会，繁衍出来的只有愚蠢。爱护优秀人物，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另一个尺度，所有的人都向优秀人物看齐，争做优秀者，这个社会才有希望，才有活力。

不管他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个“狂”字，他身上确有狂这种东西。人们熟悉他经常性地口出狂言，除了在几个人的小场合，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时也如此。在参与社交的任何场合，他都得成为中心，否则便感到不习惯。顺便说说，周涛的口才极好，他的嗓音非常特殊，有些哑，好像还带点鼻音，就这么一副奇怪的哑嗓子，却非常地

抓人。他的讲演旁征博引，非常机智，危言耸听，常有些超越常规思路的新鲜观点，妙语连珠，口若悬河，常使四座倾倒。但是，这种时候他往往情不自禁地还是要流露出他的狂劲，不过，这样的狂，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。所有认识他的人，好像都认定了狂是周涛身体的一个重要部分，而且是标志性的一个重要部分。周涛要不狂，那还叫周涛吗？

但是，也有他狂得不被认同的时候，那是他狂得失了态，狂得有些走火入魔的时候。这种情况，多半都是酒给他惹的麻烦。

周涛能喝点酒，但在高手如林、猛将如云的西部伟大酒徒面前，他的酒量充其量能算个小儿科。半斤酒，足可以坏他的事。一次，他参加一位老作家创作生涯 50 周年研讨会，会上他发言，对老作家表示敬意，态度诚恳、彬彬有礼。饭桌上被灌了些酒，忽然大耍酒疯，大出狂言，闹得大家面面相觑，瞠目结舌，不欢而散。事后，他很感后悔，也有些内疚，写了篇“瓶中何物”的文章，委婉地表示歉意和自己对黄汤猫屎的全部看法。

还有一次，在一个有百人参加的文化理论座谈会上，也是因为喝了过量的酒，他发了个出口不逊、刺激了不少在座者的言，还夹杂了些粗野的骂人话，言发完后他便扬长而去，使那些被刺激的人气愤得要命。一位女士踉跄出了会场，刚下台阶便晕倒了。醒来后连说可怕。那两天里，至少有五个抗议电话打到我家。他们见不上周涛本人，便借我的电话出气，他们感到被人无端地侮辱、伤害了。

如果说他有时伤人的话，大约指的就是这种情形。他伤了人，但能在内心进行自责自省。他感到了人们对他的宽容，他感激这个。他知道自己身上确有狂这种不好的东西，“但我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我觉察了这个。我努力地抛弃它。”“假如我身上还残存着这种

弱点，我愿丢弃。”他认为，狂是一种把自己摆在比较低的位置的姿态，是不知深浅的庸人的愚昧体现。因此，他最不喜欢那种从井底爬上去，爬上树，跑到鸟窝里去冒称一只鸟的蛙。

很少有作家能这样坦诚地向读者展开自己的缺点和弱点。其实，向热爱自己的人们坦露一点灵魂和真实的东西，并不失去什么。作家、诗人也是人。

四

1992年10月的一天，周涛忽然往我家打电话，约我到昌吉的朋友陈友胜家里去做客。友胜是他的朋友，也是我高中时代的高班同学，一生嗜诗如命，虽命运多蹇，历经坎坷仍不改初衷。他有两个诗友钱世林和张侠，也是同样的诗痴。三人自称昌吉三剑客，常聚首在一起酌酒吟诗，游哉悠哉。

在高楼林立的昌吉城里，友胜的家是最为过时和寒伦的，躲在大片破旧土房子中间，乱七八糟的胡同小巷像迷宫一样让人辨不出方向，到处都是泥泞和垃圾臭水。周涛说他认得门，胡乱钻了好些巷道，才逶迤找到地方。穿过一条只能容得一人通过的短巷，才到友胜的院子。高大壮实的主人正在小院的露天灶台上煮羊肉，房子里空空荡荡的没什么摆设。友胜说，好点的东西都给老婆了。原来他已经离了婚。

这一夜，周涛、三剑客、我，五个男人，围着一张杂木桌子、一炉火，吃了一只整羊，喝了六瓶本地产的榆泉酒，纵笑豪饮，大谈文学。

文学被挤到这个社会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了，但放逐与被排挤的结果，是这些痴心文学的人空前地心心相印了。窗外，绵绵的秋雨一直在下，屋里炉火很旺，不时有风穿过寒窗，将原野的潮湿泥

土气息送进来，这气氛非常地温馨，非常适宜于袒露真诚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。在这个被周涛称之为“心灵自由的一个黄金夜晚”，连男女情事这样的秘史也都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。文学和这类事情原本就极容易搅在一起。

陈友胜瞪着充血的大眼，用土得掉渣的昌吉话说，老婆子不要行哩！诗绝对不能不要！如果连诗都写不成了，那老子还不如去跳楼跳水库死球掉算了！

我回忆起十几年前发表小说处女作《客路青山下》时的情形，在等候出刊的那三个月里，我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的小说，几乎把每个字、每个标点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

我没有料到这话使周涛流泪。他用双手捂住了脸，我有些诧异，以为他在窃笑，很快发现是在哭。相识二十年了，我没见他哭过。我没有想到他哭起来是这样的。双手紧紧掩着脸，好像掩着巨痛的伤口似的，发出痛楚而悲怆的呻吟。他这样子，使大家突然一阵心酸。后来他告诉我，我那些平平常常的话，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自白，就像风暴一样，席卷了他的全部尊严。这世界，太藐视真诚了！

而文学，是需要付出全部的真诚才能从事的事业。在新疆，在西部，所有希图留下一些“真迹”的作家诗人，都必须面对一种几乎无望的残酷处境。地理位置的遥远、闭塞、荒凉和空旷，注定了这些人必须长期忍受寂寞的命运。西部人只有付出远远高于内地人的努力，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声音在远方传出回音。花环和掌声永远都是献给舞台上的走红角色的，无缘走进舞台中心的远徙者只能在远处遥看捧杯者的荣耀。许多被放逐的人，就像炭头黑脸的士兵，在弥漫的硝烟中，从坚守的最后一道壕堑里倒下去，永远消逝。比起这些人来，周涛的命运要好一些。他不愿意被湮没，也的确没有

被淹没。

但对他的公正公平的认识却总是姗姗来迟。在他以诗名世的时候,无论他如何做出种种突破的努力,写出多么优秀的诗作,引导舆论的评论家和教授们一律都把它们归到“西部诗”和“边塞诗”一类,好像西北地区的诗人们只配戴这一顶“桂冠”,不管他们的脑袋有多大,思维的空间有多么浩瀚,都只能归此一类。这结果是,差不多所有写诗的人,包括杨牧、章德益在内,都对“西部”躲犹不及。

迄今为止,周涛的散文已逾百万字,许多篇什在热爱散文的广大读者中流传,深得好评。他的中、长篇散文如《伊犁秋天的札记》《吉木萨尔纪事》《蠕动的屋脊》《哈拉沙尔随笔》《游牧长城》《读〈古诗源〉札记》等,恢宏浩大,华彩飞扬,一篇比一篇出色。但不知为什么,一些专门收集和研究、讲授当代散文的人却对此视而不见。这情况直到前年还是如此。号称“文学黄埔”的鲁迅文学院,讲授当代散文的教授学者们列举一长串当代散文家的名字,连三流的都可入选,唯独没有周涛的名字。而周涛,是当之无愧的最好的散文家。

不为人识是一切艺术创造者的悲剧。远离现代文明的中心,则使这悲剧更甚。

生活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是有些遗憾的。许多新疆人在内地漂亮的地方转了一圈,便心生疑问,世界上的好地方那么多,为什么我们偏偏生活在这么个地方?地方不好,人的素质、人的环境也逊人一等,封闭、停滞、窒息、不文明、少见识,到处泛滥着偏狭、猜忌、隔膜、困扰、愚蠢和刚愎自用,还有不可救药的夜郎自大,莫名其妙的排除异己……

就这么个地方,要罗列它的不好,可以说上三天三夜。但是周涛还是爱它。爱得很深,简直有些难舍难分,一往情深。

别的地方再好,你屁股一拍走了,没事了,这儿不行,在这儿待

着你百无聊赖怎么也不顺眼，一离开它你就牵肠挂肚，它能让你想起来流泪。听见一支这样的曲子，比如《塔里木河》啊、《塔什瓦依的传说》啊，你会热泪盈眶；看到公路边一个骑马的穿皮裤子的老哈萨克，他赶着一群乱七八糟的破羊蹒跚独行，你也从心里难受，觉得他是你的一部分，可怜的而又坚忍的那部分。这就是土地、生活、命运和你自己，你别无选择了。

这是周涛在他的散文集子《稀世之鸟》后记里说的一段关于新疆的动情的话。

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一块属于他所守望的土地，无论他在大地上做多远漫游，他最终都得回到这块土地上，这是他的精神家园，是他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，是接受乡土人情熏陶的温床。就是立足于这样的一块广大、苍凉的土地，使周涛的创造灵感源源不断，使他不知不觉地拥有了一条通向大作为、大境界的至珍之路。

五

那一年，他参加中国作家一个代表团，出访意大利。辗转回来，如释重负吁了口气：“啊，总算到家了！”

问他在意大利观感如何。支吾一阵，扬起脸说：“没啥意思。”

他还是喜欢闹哄哄的、弥漫着烤羊肉青烟的乌鲁木齐。还是觉得这儿呆着舒心、自在。每次出远门回来，街上和农贸市场邂逅一道，觉得看谁都那么顺眼，那么亲切。

他把他的写字桌横着摆在通阳台的门窗跟前，这个位置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博格达雪峰。这座东天山山脉最高的山峰，整个山体泛着一种坚硬有质感的蓝，高踞于迷蒙的紫色云烟之上，庄严而高洁，使他感到安宁而又浮想联翩。在经常的凝视中，他感悟着这伟

大山脉的神性，使文思神驰飞扬。他的散文多展现大山川、大历史和人世沧桑的大气象、大风貌，天地时空，蔚为壮观，这风格的点化，也许就是这山的功劳。

这些年来，随着市场经济的波澜壮阔，东西部差距的愈来愈大，新疆的才俊大批地流向关内和沿海，以图更大的发展。文坛上，也一个接一个地在走，客籍的作家诗人不说，本土的或二三十年疆龄以上的，走了的就有杨牧、陆天明、唐栋、周政保、文乐然等，一个，挥泪而去。不忍离去，终归还是走了。

周涛往后会不会考虑走的问题，不得而知。前不久好像也听到一点要走的风声，后来又被证实仅是风声而已。我是相信事实的，至少他现在还在这个城市里。

我不敢说他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始有终，始终如一。但至少决定人一生的、关键的几件事上，他是专一坚守、毫不动摇的。比如事业、信念、家庭……等。

周涛1.8米的个子，在颇多丑男陋女的文坛，他算得是才貌双全。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，演义一点风流故事是难免的。大多人都认为他的风流故事很多，他给人造成的印象也是这样。在这种事上，他像美国人一样的爱张扬，大多都是逢场作戏，故作君子好逑状，转过脸便忘得一干而净，或一逃了之。在任何的诱惑面前，他心里都有数，绝不做任何危及家庭的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是个传统文化的维护者，道德人伦，修身齐家，俨然儒士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他还是个孝子。他很爱他的父母，在他的散文里，留下过关于父亲母亲的文字，都非常动情，非常美。他如今的四口之家，有一位成员是他的岳母，周涛对这位母亲也极尽孝道。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，相处和睦，家庭气氛温馨而融洽，他对他的弟弟们也很关心，数年前，为了晓红的工作调动，他多次找过我，

请我帮忙，至今我还保存有他为兄弟求取而写给我的信。他是个充满爱心的人。

六

他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书。

他说，多年来，我突飞猛进，仿佛有点战果累累，而实际上是我始终没有找到那件事的边缘。

说这话的周涛是清醒的、谦虚的，因而也是渺小的。

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渺小。在由大师们绵延起来的崇山峻岭间，他徘徊仰望着，那种自惭形秽的压迫感，就像梦魇一样地紧紧地跟着他。

而人生是短促的，岁月倏忽如白驹过隙，一些作家，人死了，作品也随之进入坟墓，永远不再有人提起。这事情，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来，如临深渊。巨大的空虚感会由此而生。

在极小的范围里，周涛有一句戏言，90岁时，拿诺贝尔文学奖。虽然是句戏言，细分析，还是有几分认真的成分在。他看到了生命给人有所作为的时间并不多。能活到九十岁的作家毕竟太少了。而生命的意义是由死亡作为背景才得以显示的。

他的目标绝不是做一个红极一时的“明星”，就像那些搔首弄姿的影视明星一样。他没有明确说过他想达到怎样的目标，但他一定想过使自己不朽的问题。他想当一个有大作品传世的那种作家。不是红上两年便被人忘得一干二净的那类作家。

这有点儿一厢情愿。

一位名叫约翰·巴思的美国人写过一本题名为《耗费的文学》的书，将智力深奥的远见、洞悉人性的见解、诗人的想象力、技巧精通的手法，作为衡量大作家、大作品的四种尺度。这几种尺度只注

重了作家主体的要素。应当补充的重要一点，还有作家与大地的血肉联系，作家本人丰富的阅历。最后，还有时代是否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作家，这不是作家能左右得了的，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，杰出的作家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出来的。文学这一行里，真正出类拔萃者的产生是异常困难的，经过无情的淘汰而最后留下真迹的，百年之中也许就那么三五个。

但他想做的，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他说：“多年来，我做的所有的事其实都在为一件事做准备，所以那些所有的事都不算事。”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当大话仅仅说说而已。他是认真地较着劲在埋头苦干。躲进写作室的周涛是刻苦的、坚忍的、发愤的，目露凶光，如同困兽。这个周涛知道天高地厚，知道自己要真正成点大气候，除了那些自己不能左右的客观条件外，剩下的便只有苦斗和苦干。1991年8月，他在送我的一本书的扉页上，送了我这样一句话，“一个作家应该以全部生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。”这是他摘录的不知谁的语录，说明他对自己要做的事已经有了足够的精神准备。他始终在努力地突破自己。

也许，答案正在这里。目标就在向目标无穷逼近的过程中。

1994.12.21——30

于乌鲁木齐浅庐